

了保持既得利益，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排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结果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奉劝湖北武汉的走资派们，要象西哈努克那样，放明智一点，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新生力量，这样既不会被历史所淘汰，还可以保持你们的既得利益，否则没有好下场。

77.2.26

· 材料之三 ·

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
配合“四人帮”在湖北大搞篡党夺权
阴谋活动的罪行



中共湖北省委材料组

Blue

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 配合“四人帮”在湖北大搞篡党夺权 阴谋活动的罪行

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在“四人帮”的指使和支持下，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冲击省委和各级党委，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在湖北地区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罪行是极为严重的。现根据目前掌握的部分材料，综合整理如下：

一、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夏、朱、胡等人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公然歪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科学论断，胡说什么：“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走资派和造反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结束，这一场斗争就不会结束。”他们蓄意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新生力量”、“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革命领导干部诬蔑为“民主派”、“走资派”，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胡说什么：“老

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到走资派，是一般客观规律。”

“老干部的履历表可以叫做三部曲：一是民主派，二是同路人，三是走资派。”攻击老干部有五个“本性”，即所谓“垄断性、反动性、贪婪性、顽固性和欺骗性”。“顽固性的表现是他们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要轻视老同志”的指示，狂叫：“老干部还有什么用？还有高抬贵手之用，你不高抬贵手，就靠边站。”妄图把革命老干部统统打倒，取而代之。他们公开逼老干部向他们交权，说什么：“湖北的老干部不会享福，占着位子不肯走”，“你们休息休息，在后面当个参谋，我们在前面干，该多好呀！”甚至公开贴出大字报，要老干部“放明智一点，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新生力量。否则没有好下场。”他们咬牙切齿地叫嚷：“我们就是要象割韭菜一样，把所有的老家伙一批一批的搞掉”，扬言“要把权从老家伙手里夺过来。”他们的同伙恶狠狠地说：“在实现全面夺权以后，要杀一批，关一批，清洗一批，下放一批，戴一批帽子。”

夏、朱、胡等人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胡说：“老中青就是老中造”。夏邦银等人讲：“老中青三结合，青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冲杀出来的造反派。这些人一定要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胡厚民说：“老中青三结合，就是要结合造反派，不能用年龄作标准。没有造反派就谈不上青。”朱鸿霞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可以说是青，也可以说是老，因为我们是革委会的第一任干部”。他们吹捧

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文化大革命的体现者”、“当然的接班人”，胡说什么：“接班人的问题，要认真从造反派中考虑”，“入党、提干的唯一标准是我们这些人”，“这是领导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中的大事，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新生力量就是造反派，造反派掌权是历史的必然，造反派不当官谁当官，造反派不入党谁入党，造反派不掌权谁掌权！”狂妄地提出：“所有造反派要掌权，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妄图把他们一伙人统统塞进各级领导班子，最终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二、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夏、朱、胡等人在“四人帮”的指使和支持下，有恃无恐地大搞破坏活动，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湖北地区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同省委和各级党委分庭抗礼。他们狂叫：“你们有你们的中央，我们有我们的中央。”他们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党中央三令五申的规定，大搞串连活动，拉山头，搞宗派，成立变相的战斗队，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去年二月，他们就秘密串连，接着，拼凑了一个所谓“七人小组”，另立中心，凌驾于省委之上。胡说什么：“夏邦银的领导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切行动听夏委员的指挥”，“夏委员叫我们冲，我们就冲；叫我们收，我们就收。”他们还拼凑了一个由胡厚民当“鹅头”的“参谋班子”，为他们搞阴谋活动出谋划策。以后又相继建立了材料组、宣传组、联络组、保卫组和后勤组，主要头目按战线、按单位进行了“分

工”。他们用“中央委员”和“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的名义，在武汉街上贴出了一批又一批大字报、大标语，蛊惑人心，混淆视听。他们到处串连，开黑会，做黑报告，煽动无政府主义，扬言要“同省委对着干”，“要搞得七处冒火，八处冒烟”，“要象电影《南征北战》中攻打凤凰山一样，克服阻力，攻下山头，活捉张军长。”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党发起猖狂进攻。

他们冲击工业，冲击农业，冲击商业，冲击交通运输，强占一些机关和工厂的办公室，制造混乱，妄图乱中夺权。他们在革委会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妄图取消党的领导，由他们来掌握各级革委会的大权。他们攻击各级革委会“改变了成分”，“名存实亡”，鼓吹推倒重来，叫嚣要“讨还一月风暴的革委会”，提出要恢复在机构调整中早已撤消的车间革委会和原厅局革命领导小组。胡厚民胡说什么：“不要怕人家说存在两套班子，有两套班子存在，可以分一分真假美猴王。”在他们的煽动下，有的人盗用革委会的名义招摇撞骗，有的人擅自挂出革命领导小组的牌子。他们围攻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搞得有些党委无法开展工作，个别单位甚至一度被夺了权。

他们公然对抗中央〔1976〕4.5号文件精神，把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革命领导干部诬蔑为“还乡团”、“复辟派”、“民主派”、“十年一贯制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派”等等。他们一方面对省委上下夹攻，一方面到处煽风点火，鼓动揪各地的“代理人”，他们胡说什么：“既有最大的走资派，就有二大的、三大的走资派；既有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就有副经理、分公司经理、采购员、营业员、推销员；

既有还乡团长，就有副团长、营长、连长，还有还乡团员。”朱鸿霞杀气腾腾地说：“现在主动权在我们手中，他们转弯子也得转，不转也得转，反正‘走资派’的帽子拿在我们手里，到时候总要落到他们的头上。”夏、朱、胡还布置他们的同伙，对各级领导干部，“要联系十年的历史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准备材料，有计划、有步骤地批。”在统一部署下，他们大整各级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有的密送“四人帮”，有的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在全省刮起了一股层层揪“代理人”的妖风。

三、配合“四人帮”，上下夹攻，妄图搞垮省委，夺省委的权

夏、朱、胡等人恶毒诬蔑省委“被走资派把持了”，到处散布“对省委不要抱幻想”，扬言“现在不是掺沙子的问题，而是建班子的问题。”他们为了篡夺省委领导权，采取了一系列阴谋手段。他们精心策划，制定反革命策略，对省委定了一个“基调”，胡说什么：“七五年前后，湖北省委忠实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全省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以围剿派性为名，打击和镇压大革命造反派”，“是林彪、刘丰以来全盘否定湖北、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继续。”胡厚民阴险地向他们的同伙布置：“要按照这个调子去讲话，写文章”，“把几个省委书记搞得昏头昏脑，承认了错误，转了弯子，下面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只要他们承认犯了路线错误，那就要听我们的了。”他们根据这个“基调”，策划把赵辛初同志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在全省广播大会上的讲话作为“突破口”，向省委猖狂进攻。他们炮制了“以缠对拖”的反动策略，妄图“把

省委缠住”。还提出要制造“大军压境，杀声震天”的“气氛”，对省委和各级党委施加压力。他们里应外合，多次冲击省委召开的会议。去年三月九日，他们冲击省委贯彻中央〔1976〕4、5号文件精神的常委扩大会议。四月八日，他们又冲击了省委贯彻中央精神的全省广播大会，并揪走省委书记，闹得省委无法进行工作。接着他们又炮制了“上促下攻（有时提‘下动’），打谈结合（有时提‘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独立自主（有时提‘统一行动’）”的十六字方针和“四不变一变”的反革命策略（即：目的不变，决心不变，基调不变，突破口不变；斗争策略多变）。他们诬蔑省委和各级党委“几乎是清一色的，基本上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老的尽是一些复辟势力，青的全是他们看中的修正主义苗子”。攻击省委“形成不了核心”，“打不开局面”。胡说什么“打倒赵辛初，是湖北四千万人民的愿望。”他们还提出要到北京汇报，实际上是要“四人帮”对湖北省委“从组织上采取措施”。去年七、八月分，他们还窜到省委在襄樊召开的工业学大庆会议和在英山召开的山区工作会议上，大搞阴谋活动，大造反革命舆论，改变会议的方向，压各级党委突击提干、纳新，按照“四人帮”的标准“转好弯子”。

夏、朱、胡等人策划“脱产上班”、“掌实权”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他们妄图借此打开缺口，搞“连锁反应”，要“地、市、县照着葫芦画瓢，上去一大批。”他们得意地说：“武汉五千个单位，每单位上二人，就可上一万人。”“在台上斗比在台下斗更有力。”他们几个人脱产后，狂妄地提出：“从现在

起，省革委会的一切文件，要经我们签字，否则一律无效。”夏、胡等人还千方百计地企图把朱鸿霞拉进党内，说什么：“不入党就进不了省委”。充分暴露了他们要夺省委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夏、朱、胡等人紧密配合“四人帮”，加快了在湖北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公开伸手要官要权，朱鸿霞厚颜无耻地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能搞伟大的谦虚”，“能上就上，当仁不让”，“要造成既成事实”。夏邦银迫不及待地对个别省委领导同志说：“快点安排，运动多，下个运动一来，就又往下拖了。”他们经过密谋策划，威逼省委要把他们“推荐”的八个人塞进省委领导班子，其中四个要当书记，四个要当常委。去年十月初，在省革委会全会期间，他们气焰更加嚣张，提出“批韩促赵（辛初）”的反革命策略，猖狂向党进攻。他们得寸进尺，胃口越来越大，提出要“向水果湖靠拢”，“所有革委会委员都要安排职务”，说什么省革委会常委当副局长是“降职使用”，要进省委各部、委、办，要当正职，要当书记。还扬言要冲破“禁区”，要进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公安局等要害部门，一时闹得乌烟瘴气。

四、插手地、县，妄图自上而下全面夺权

夏、朱、胡等人为了篡夺湖北各级领导权，极力插手地（市）、县，四处点火，八方串连，制造混乱，妄图乱中夺权。

夏、朱、胡等人经常对地、县的同伙面授机宜，他们时而亲自出马到各地点火，时而派人到地、县去煽动。他们还设立秘密联络点，到处牵线挂勾，大搞反革命串连。他们对下面的同伙说：“我们在

上面捅，你们在下面捅，你们把下面捅垮了，上面就好办了。”并煽动说：“你们不要存在幻想，要斗，不斗也是被整死，斗也不过是死，还有胜利的可能。”提出：“运动要分三个阶段，一是头头运动，形成核心；二是大造舆论，搞到社会上去；三是夺权。”并诡辩说：“不要怕人家说我们串连，我们都是各级革委会的成员，坐在一起商量一下运动，有什么不行，怎么叫串连呢？”“要说我们是串连，那么省委找地委开会，地委找县委开会，也是串连。”“如果有人说你们脱离党的一元化领导，你就说，领导我们的有中央委员，有地、县常委，怎么叫脱离党的一元化领导呢？”胡厚民还指使他们的同伙说：“要采取滚雪球的办法，一搞起来人就多了。”

“要把头头集中起来学习，整几天风，统一思想，冲破阻力斗下去。”在夏、朱、胡的指使和支持下，他们的同伙就在下面狂叫：

“我们要闹，闹得地委不安宁，县委不安宁，闹得各镇、社不安宁，闹得他们不能吃，不能睡，一直闹得他们投降为止。”他们紧密勾结，上下呼应，矛头指向各级党委，把各级领导干部诬蔑为“七派一团”，即所谓“走资派、民主派、复辟派、翻案派、反对派、算账派、保守派、还乡团”，诽谤基层干部是“贫下中农出身，民主革命思想，资产阶级生活，地主恶霸作风。”夏、朱、胡等人对襄阳地区的同伙布置说：“襄樊市的问题在地委，地委的问题在××，××是典型的走资派”，“在枣阳不要搞别的，要搞×××”。唆使他们的同伙写黑信、告黑状，大肆搜集、整理各级党委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并传授反革命策略说：“你们要讲斗争策略，出一批

大字报要等一等，听一听反映，这就叫打一拳，看看打得怎么样，看准了再打。”“要今天当面斗，明天会下斗，发动群众斗，扔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形式多样，灵活运用”。胡厚民阴险地说：

“这次运动说穿了，就是要通过老干部的手，把你们扶起来，搞个合法地位同他们斗。你们要准备子弹，像《平原游击队》中对付两个‘白薯’（密探）一样，手枪扣上子弹，顶着走资派，要他们讲话，叫他们自己打倒自己”。朱鸿霞说：“你们要死死缠住县委，让他们找赵辛初，赵辛初找我们，那就好了。”

夏、朱、胡等人还指使在一些地、县的同伙，积极做好夺权的组织准备工作。提出：革委会常委凡是党员的都要进党委；不是党员的要突击入党，然后进入党委；各部、办以及各局、委都要由“造反派”掌权，甚至连生产大队也准备换上他们的人，妄图自上而下全面夺权。

五、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破坏革命团结

“四人帮”大搞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制造乱局，乱中夺权。夏、朱、胡等人紧跟“四人帮”，竭力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猖狂地进行分裂活动。他们吹捧自己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正确路线的代表”，把湖北广大军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的贡献据为己有，胡说什么：“没有造反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天下是我们打的，他们沾了光”（指结合在革委会的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对造反派的态度问题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

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具体说就是对造反派的态度问题。”谁敢说他们一个不字，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他们把反对他们胡作非为的群众，统统斥之为“走资派派生出来的力量”、“保守派”、“右倾复辟势力”。把他们内部起来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投降派”、“宋江式的人物”。胡厚民还公然为他的“三个长期斗争”的反动谬论翻案，继续鼓吹“革”与“保”要长期斗争下去。胡说什么：“搞来搞去，还是我那个‘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你们看，现在的问题，还是这三个长期斗争，看来得斗半个世纪。”

夏、朱、胡等人为了压制和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总是制造各种借口，寻找各种机会，妄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九七六年四月，武汉地区一些群众出于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怀念，自动地送了花圈。夏、朱、胡等人借此大作文章，扬言“要揪出幕后的策划者”。他们一方面搜集、整理群众的黑材料，送给“四人帮”；另一方面给省、市委施加压力，围攻领导干部，妄图把武汉地区革命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打成“反革命政治事件”。一九七六年六月，武汉有些革命群众冲击了一度被夏、朱、胡等人插手的《长江日报》，夏邦银立即给王洪文办公室打了四十分钟的长途电话，大告黑状。他们狂叫：“要抓住这一事件，狠狠回击，打一个翻身仗。”他们一方面指使《长江日报》停刊，给省委施加压力，逼省委给这个事件“定性”、抓人；同时，大整黑材料，由朱鸿霞亲自带到北京，转送给“四人帮”。更恶劣的是，他们还把自己制造的谣言说成是别

人讲的，并整成黑材料，送给“四人帮”，嫁祸于人，企图迫害一大批革命群众。

六、鼓吹反军乱军，破坏民兵建设，妄图毁我钢铁长城

“四人帮”把人民解放军看成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总是千方百计地妄图搞垮我们的军队。夏、朱、胡等人也跟着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叫嚣要“夺军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夏邦银煽动说：“现在部队问题很难办，王洪文讲了，现在主要抓部队。要把部队抓过来就好了。我们要配合。”他们打着“彻底查清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旗号，大肆搜集、整理部队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全面否定部队“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恶毒攻击军代表“把造反派都打成了五·一六、北、决、扬”，炮制了“攻三办，促省委”的反动方针，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代表，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的逆流。去年，他们又大肆传播攻击军队负责同志的反动言论，搜集军内情报。夏邦银叫嚣说：“部队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朱鸿霞狂叫道：“×××还在，×××还在武汉，我们要警惕。”

夏、朱、胡等人还极力破坏民兵建设。他们打出“革造民兵”的破旗，妄图拼凑一支“第二武装”——“工人纠察队”，与人民解放军相对抗。他们的一个同伙叫嚷说：“我对民兵是有计划的，要上到下搞一些造反派进去。”他们还攻击“人武部靠不住”，要把民兵的武器、弹药和民兵训练工作的管理权限从武汉警备区划出来，由他们直接控制，妄图把民兵组织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

具。

七、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为一小撮阶级敌人翻案

政治流氓王洪文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夏、朱、胡等人对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同样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诬蔑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镇压造反派”，“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公开煽动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为一小撮阶级敌人鸣冤叫屈，大刮翻案妖风。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夏、朱、胡等人就配合“四人帮”，攻击“一打三反”和“两清”运动是什么“大搞白色恐怖”，妄图翻“一打三反”的案，翻“两清”的案，提出“放、平、补、提、纳”的反动口号，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冲击监狱，强行要公安机关放人，公开为坏人翻案。一些人被释放后，大搞阶级报复，殴打公安人员和专案人员，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去年，夏、朱、胡等人把为少数坏人翻案作为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鸿霞叫嚷：“现在要公开平反、复职、恢复党籍、补发薪水、开牢放人。”他们又一次公然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公开提出为杨道远翻案，胡说什么“杨道远是武汉地区优秀的红卫兵代表”。夏邦银嚣张地说：“老是说杨道远的案不能翻，究竟定了什么案？是谁定的案？一讲就说是中央定的案，究竟是哪个中央？”朱鸿霞叫嚣说：“杨道远的案不翻，在湖北就谈不上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我们是一直要翻到底的！”他们还密谋策划为已判了刑的谢妙福等人翻案，把矛头指向党中央。

一九七六年三月，朱鸿霞、胡厚民叫嚷说：“去年省、市委把谢妙福抓起来，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是杀鸡给猴看”。他们多次在街头上集会，攻击武汉市委一九七五年“二·二七通告”“是镇压群众的铁证”，胡说谢妙福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大受害者”，狂叫“血债要用血来还”。他们还拼凑班子，为这些人写翻案材料，说什么这些人“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坚定的造反派头头”，“把这些人抓起来完全否定了批林批孔运动。”

夏、朱、胡等人大肆鼓吹“十七年受压的最革命”，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处分的人，都被他们看成是“路线斗争觉悟高”的“先进分子”，竭力为这些人鸣冤叫屈，胡说什么被开除党籍、工作籍的人，都是“敢于和错误路线、错误思想斗争的同志”，明目张胆地给这些人打气说：“你们要不怕受压，不要动摇，坚决斗下去。”唆使这些人到处张贴大字报，恶毒攻击和丑化文化大革命，把社会主义祖国说得一团漆黑。去年六月，他们还指使少数人强行进驻武汉市公安局，围攻领导同志，直到“四人帮”被揪出以后，才被迫撤离。

八、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妄图搞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夏、朱、胡等人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在“四人帮”的指使和支持下，对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极其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他们大肆宣扬“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左派革命，右派生产”、“法家革命，儒家生产”等谬论，煽动那些跟着他们跑的人离开生产岗位，制造停工停产，胡说什么：“只有闹得全面停

产，把问题搞得大些，闹到中央，问题才能解决。”

夏、朱、胡等人冲击工业是有预谋的。他们说：“湖北的问题在武汉，武汉的问题在武钢。要搞乱湖北，首先要搞乱武汉；要搞乱武汉，首先要搞乱武钢。”由于他们的干扰和破坏，武钢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三年中总共少生产钢×××万吨，少生产铁×××万吨。全省一九七六年工业总产值少完成××亿元。如果从他们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算起，三年来全省工业总产值少完成××亿元，财政收入少完成××亿元。全省棉布三年共损失×亿×千万米，相当于全省一年的销售量。原盐，三年共损失××万吨，接近全省一九七六年销售量的两倍。有些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亏损增加，有些商品市场供应紧张，不仅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

夏、朱、胡等人插手地、县，对农业的破坏也是很大的。他们对抗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破坏农村现行的经济政策。他们为了把全省农村搞乱，抓住“杨垱事件”大作文章，胡说什么：“全省看枣阳，枣阳看杨垱，杨垱是鄂西北的曙光。”公开指使和支持那里的少数坏人搞翻案复辟活动。由于“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夏、朱、胡的干扰和破坏，削弱了各级党委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和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影响了我省农业学大寨的步伐。

大量事实证明，“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夏、朱、胡等人在湖北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对湖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干扰破坏

极为严重。他们是湖北省多年来不得安宁的总根源。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放手发动群众，联系湖北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夏、朱、胡等人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六日整理)